

傅雷的最后17年

在历史的废墟上 仍能隐约听到他精纯的声音 家书与家国情
思想的芦苇脆弱而优美 令人伤怀 让心明净

叶凯◎著



是且的念是小卑嚮的不
慧怯挑
工和力而上的的不
號踏。這五是；'經戰
式實大一年我中逃劫門
的地家切來們庸避難的
'的都與的'現磨的
我前在由日致苟實煉舍
們進前于俱命且的的弃
國'進貝增傷'明超是
家絕'多的'小哲脫虛
雖不面芬信這智是是偽



傅雷的最后17年

叶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的最后17年 / 叶凯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7

ISBN 7-5034-1662-9

I. 傅... II. 叶... III. 傅雷 (1908~1966)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8457 号

责任编辑: 张 馨

封面设计: 80 零 · 小贾 + 苏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10140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数:** 210 千字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662-9/K · 1122

定 价: 2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敬文东

20 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 20 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 20 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 20 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 20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

们的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需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的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3月2日



1	引 言	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4	第一章	在初春里徘徊
34	第二章	上海一家人
70	第三章	一个代价昂贵的春天
94	第四章	催人老的这一年
122	第五章	傅聪的叛逃让父亲“多活了十年”
153	第六章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
183	第七章	风暴之前的平静
214	第八章	一句谶语 一次精心营构的死
245	第九章	道不完的身后事
276	附录一	傅雷生平年表
286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87	后 记	



人总是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至于哪个世界才是自己存在的真正目的，那就因人而定了。对傅雷来说，精神的独立或许才是他真正的生命之所在，可以说，傅雷一生都在寻求与实践这种精神的自我诉求。这种精神的诉求并非简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玄想，而是对个体的自我存在价值的探求。

在1937年出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的“译者献辞”中，傅雷这样写道：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

——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难，不是征服内界而是征服外界的战迹，它是千百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阙大交响乐。

建国后的1952年，《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出版时，傅雷在作品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

本书一方面描写一个强毅的性格怎样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它不但成为主人翁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并且是一部音乐的史诗。另一方面，它反映二十世纪初期那一代的斗争与热情，融合德、法、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用罗曼·罗兰自己的话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傅雷最重要的译作之一，他前后共翻译出版了两个译本，并多次写文章对这部作品进行评介。从上面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傅雷始终是从“精神”的角度理解这部史诗性作品的，并与罗曼·罗兰和克利斯朵夫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如果再仔细了解傅雷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译著和论著，我们就会发现，对一种完美精神世界的追求，既是傅雷一生的自我约束，又是我们解读傅雷的一把钥匙。

傅雷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对朋友、对儿子、对社会，几乎都在苛求着完美，有时甚至近乎极端，就像他对儿子傅聪的教育那样，使儿子经常感到难以忍受，也使朋友们感到难以理解。但这是傅

雷做人的信念。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才造就了被人敬仰的傅雷，造就了“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楼适夷语）。

傅雷并非超凡脱俗的圣人，也并非勇往直前的斗士，他只不过是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行事罢了。他有过盲从，有过惊慌失措，直至晚年几乎完全退回书斋之中，不问时世，但是时世却并没有放过他。

建国以后，同其他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傅雷也为时代的改天换地而欢呼，为人民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同样急切地盼望能够彻底抛弃旧我脱胎换骨成为新人。他在努力工作，用他的笔、他的真诚、他的热情，为时代与人民服务。当暴风雨来临时，他也同样害怕、恐惧、愤怒、狂躁、不知所措，但是，同其他很多人不同的是，他又绝不会因为害怕与恐惧放弃自己的思考。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听上去说的就是傅雷这样的人：虽然脆弱，却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毁灭来维护它……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

1 1949年的傅雷已经是国内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翻译家，而在中国历史发生剧变的时刻，傅雷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人民解放军开始以摧枯拉朽之势从东北打到了中原。此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国民党的败亡已经无可避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很自然地开始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

尤其是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更要考虑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走，有两条路，或者海外，或者台湾。没有几个人想去台湾，蒋介石

连大陆都守不住，区区一个台湾海峡又能挡住什么呢？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替国民党尽忠，因为人们已经对这个政权彻底失望了。

去海外又能怎样呢？没有任何根基的人即使去了，靠什么生存就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不错，胡适是坐飞机跑到美国了。但胡适在美国生活多年，而且人家已经在美国获得了3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在美国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自己到国外干什么呢？再说了，当时中国教授工资很高，许多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的收入，他们知道，到国外能够享受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留下呢？这也不是容易决定的事情。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尤其是从日常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常常是负面消息。不过从民间传来的各种消息都显示出，这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

熟读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想法：一个新朝代的建立，总会伴随着一个“开国盛世”的出现，这往往是百年不遇的事情。

处于这样一个剧变中的傅雷，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走还是留？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傅雷一生中，这样艰难的选择并不多见，此前可能只有一次。那是在法国。当时的傅雷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可能同其他人一样，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总是同爱情有关：傅雷狂热地爱上了一个法国姑娘——玛德琳。

1927年，只有19岁的傅雷来到了巴黎。一开始是学习语言，半年后，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在塞纳河的清风吹拂下，在卢浮宫中无数大师巨作的冲击之下，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艳丽的夕阳中，傅雷的艺术天性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与此同时，在法国式浪漫的重陶之下，那种在古老的中国可能会被压抑的天性，也在傅雷身上爆发了出来：性格内向的傅雷进入了狂热的爱河之中。

对于这段感情，傅雷的老朋友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开始是法国女郎玛德琳比较主动。这位女郎会弹会唱，喜欢探讨艺术，但理解并不深刻。傅雷的人品、学问，很使玛德琳倾倒；年青的傅雷，穿着当时艺术家流行的服装，打着花式领结，留着长长的头发，昂首天外的神态，颇有中西合璧的风度，更使玛德琳这位西方女郎所迷醉。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有如地中海的海水一样碧蓝，与傅雷谈起话来，就像塞纳河的流水声啾啾不绝。两人频繁接触当中，感情逐渐炽热起来。尽管傅雷早就爱上了朱梅馥，但现在面对有着共同爱好的玛德琳，他觉得，这位迷人的法国女郎，要比表妹可爱多了。^①

这里的表妹指的就是傅雷的未婚妻朱梅馥。同那些20来岁初入爱河的年轻人一样，在傅雷心中，爱情也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虽然在此之前，由守寡的母亲做主，要他和远房表妹朱梅馥结为秦晋之好。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包办婚姻，但对于陷入爱河的傅雷，或许只有在玛德琳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20岁的傅雷，一贯孝顺的傅雷，面对这样的抉择，又该如何向母亲解释？这一切，都让傅雷难以决定。

在无数次失眠与痛苦的自我斗争之后，爱情的力量还是战胜了一切，也可能一开始傅雷就知道要为爱情而牺牲一切，只不过难以决定的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告诉母亲。最终，傅雷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母亲。在信中，傅雷说，自己已经是成年人，婚姻应该由自己来做主，希望母亲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约，也希望表妹能够有自己的追求与选择。信

^①转引自金梅《傅雷》，第40—41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写完了，傅雷却没有勇气寄出去，于是采取了一个掩耳盗铃的方法，让好友刘海粟帮他寄出。但不久又要了回来，还添了一句：儿在异国已经有了意中人。不过，过了一会儿又涂掉了这句话。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傅雷，内心是多么的矛盾与混乱。

这可能是傅雷成人以后独立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决定做出后，傅雷感到了这些天来少有的轻松与解脱，兴冲冲地去找玛德琳，要把自己的决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

这时的傅雷很可能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为此感到后悔。爱情的魔力使他忘记了一切，可是，当他冲到玛德琳那里的时候，一幕意外的场景让他惊呆了：玛德琳正在同另一个男子热烈地拥抱着。失去理智的傅雷抄起一把椅子就砸了过去，幸亏没有砸中。在玛德琳的解释与亲吻之下，傅雷慢慢平静了下来，还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罢了，确实没什么了不起。两人于是和好如初。

此后，玛德琳虽然依然爱着傅雷，但法国姑娘的天性使她无法断绝与其他男子的来往，而这是傅雷最难以忍受的。虽然对法国文化中特有的浪漫品质已经有了深深的了解，但让傅雷接受心上人与自己交往的同时还同其他男子藕断丝连，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当傅雷向玛德琳求婚的时候，玛德琳却觉得虽然两人相爱，却没有必要用一纸法律文书约束自己的自由。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烈地冲撞了起来。

作为一个中国人，相爱、结婚、终老一生是人生的必然过程。傅雷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于法国姑娘玛德琳来讲，相爱并非一定意味着结婚。傅雷和他情人都无法说服对方。在不断争吵又不断和好的过程中，傅雷都快要崩溃了。他甚至想到了拿枪自杀。

最终，在年长自己10岁的刘海粟的劝说之下，傅雷平静了。他开始冷静地思考这段感情。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傅雷真正认识到了婚姻的困难，于是，他同玛德琳冷静地分手了。虽然玛德琳对此感到难

以理解，但是，她尊重傅雷的选择。

感情的纠葛结束以后，傅雷开始为自己写给母亲的那封信感到后悔了，他不知道远在家乡的母亲看到信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妹知道这件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更不知道自己回国以后该如何面对她们。他只知道，自己的决定对她们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傅雷由此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之中。

而这时，刘海粟夫妇却告诉傅雷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封信他们并没有寄出去。事情是这样的：看到傅雷失去理智的样子，生活经验要比傅雷丰富得多的刘海粟，预见到这样的感情肯定难以持久，也想到了这封信对傅雷母亲和未婚妻所造成的打击，所以在寄信之前先把信拆开看了一下，然后夫妇二人决定不寄出这封信。此时的傅雷，已经无法责备刘海粟私拆并扣压自己的信件这个举动，他有的只是感激与悔恨。

一段看起来惊天动地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带着一颗满目疮痍的心灵，傅雷离开了巴黎，到了莱芒湖。

在莱芒湖畔，大自然的泥土和芳香使傅雷慢慢地恢复了过来，不久他回到了巴黎，潜心研究语言和艺术；一年多后，又回到了上海。学成回国对于傅雷而言，倒不是一个难以决定的事情。守寡多年、辛苦养育自己成人的母亲，在盼着自己回去照顾；传统的衣锦还乡观念，也使傅雷想早一天回家去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况且，对表妹的愧疚也使傅雷急于回去补偿。

1931年，23岁的傅雷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刘是该校校长），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当时的大学教师收入不错，许多海外归国的文化人都选择了教书这一职业。此后，傅雷或者以教书为生或者以翻译为生，终于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知名学者。就这样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后，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又一次摆在了他面前。

从1949年年初开始，谁都看得出来，改朝换代的时刻到了，对此，傅雷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虽然傅雷一向不主动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对政治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实际上，他对国民党的专制与暴虐深恶痛绝。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想。多少年来，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一直是傅雷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是否就是自己梦中出现的那个国家呢？对此，傅雷没有把握。

其实，傅雷这时的心态，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几乎完全一样。虽然诸多左翼朋友曾向傅雷介绍过共产党，但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傅雷不愿做出简单的判断。这是他的习惯。傅雷此时又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困境之中。同上一轮的抉择类似，让自己做这样的决定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最终傅雷还是决定留在国内。

抉择虽然做出了，傅雷却没有上一轮的轻松感。上一次可以为了爱情抛弃一切。这一次呢？傅雷可以抛弃什么呢？结婚十几年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庭，傅雷的决定不仅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后半生，而且有可能会影响一家人的幸福。这样的决定能让人轻松吗？

许多年之后，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燃遍整个中国，神州大地被一片片红色的海洋所包裹，“革命圣火”烧到了傅雷家中的时候，傅雷又面临了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选择。这时的他已经知道，这是他们夫妇一生中最后的抉择了。他肯定知道，自此之后，他再也不会有什么沉重的感觉了。他将会在天国找到安宁。这对一个一生都充满波折和焦虑的人来说，或许不失为一种上佳选择。

2

1948年的上海已经是硝烟弥漫。

这时的傅雷已经举家来到了云南的昆明避难，积蓄早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老家的田产从抗战起就陆续变卖了大半，为了此次出行，他又把剩下的田产卖了一些，然后把上海的房产抵押出去，这才得以在昆明一家旅馆里面住了七八个月。1949年6月，傅雷一家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的几个里，正是傅雷内心激烈斗争的时候，到底是留在国内还是出国另谋出路，傅雷难以决断。

就在傅雷逗留香港期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确是让每个中国人振奋的时代。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汇聚一堂，共同迎接创作生命中又一个春天的来临。虽然傅雷还远在香港，但“文代会”的名单中，有傅雷的名字。

此后不久，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诞生了。而在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天安门城楼上，同他站在一起的，不仅有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共产党人，还有12个民主党派的代表。这些民主党派的代表，正是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同专制进行着长期坚决斗争的民主人士。同时，在成立的中央政府各部门中，民主党派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3人；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政务委员15人中，党外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傅雷表明：一个民主、开明的新的人民政权诞生了。远在香港的傅雷对这一切，显然无法默然对待，他心中的热血开始汹涌。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傅雷做出了继续留在祖